

第二章 對外投資文獻回顧

本章首先將過去有關對外投資理論，依照時間的順序作歷史性的回顧，使我們對廠商採取對外投資的行為有更深一步的瞭解。接著再介紹有關對外投資對投資國就業影響的文獻，探討過去相關研究所探討到的層面與結果，作為本研究的參考。

第一節 對外投資理論

在 1960 年之前，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並不普遍，直到 Hymer (1960) 提出相關理論之後，對外投資理論逐漸豐富起來且呈現多元化的情況，以下將幾個重要理論描述如下：

一. 產業組織理論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Hymer (1960) 研究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認為廠商對外投資不只是資本的移動而已，而包括技術、管理、行銷以及企業文化等資源的轉移，並認為廠商是處於不完全競爭中。因為廠商擁有特有的優勢 (firm-specific advantages)，而這些優勢足以克服在國外市場所面臨到的不利因素，包括對當地市場的不熟悉、風俗習慣、法律制度、與決策中心距離遠等問題。而這些優勢包括商譽、行銷、管理、技術等無形資產 (intangible assets)，並且可以運用很低的成本將這些優勢移轉過去國外使用。實證的文獻亦支持 Hymer 的論點，如 Horst (1972)、Cave (1974) 和 Chen (1992) 認為廠商的無形資產、產品差異化和廠商規模均是影響廠商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

二. 產品週期理論 (Product Cycle Hypothesis)

Vernon (1966) 利用產品週期的個體經濟理論，來說明美國多國籍企業在第二次世界後的對外投資行為。他將產品的生命週期分成三個階段：

(1) 新產品期 (new products)

新產品的開發往往在需要大量資金和技術的投入，而且新產品的價格較昂貴，加上高所得及高技術先進國家的消費能力較高，而且勞動成本已高，因此適合將人力運用在創新的活動上，從事新產品的開發，此時產品是屬於技術密集生產階段。

(2) 成熟品期 (mature products)

由於技術的外溢與普及，生產方式出現某種程度的標準化，本國在此產品的獨占力慢慢消失，而且其他先進國家的需求提高，廠商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於是會在其他先進國家進行投資生產，此時產品是屬於資本密集生產階段。

(3)標準化期 (standardized products)

當技術達到普及且產品也已經標準化之後，生產成本就是廠商最大的考量，所以廠商就將生產活動移至低度開發國家，再將產品回銷至國內，此時產品是屬於勞力密集生產階段。

產品週期理論的主要貢獻在於加入時間的考量，且說明對了外投資和貿易的動態關係。不過廠商為何要放棄授權方式，反而採取對外直接投資的行為，此理論並未有合理的解釋。

三. 內部化理論 (Internalization Theory)

內部化理論是從 Coase (1937) 所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論發展出來的，Buckly and Casson (1976) 認為當本國廠商要進入國外市場時，如果外在的交易成本很大時，就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來代替出口或授權等方式，也就是直接在企業內部構成供給與需求。而且如果像生產技術有很高的外溢效果時，為了避免被競爭者學習，就會選擇自己掌握生產技術的使用使之內部化，於是就產生了對外直接投資。如 Jeon(1992)在實證文章中提出廠商因為貿易障礙產生了很大的交易成本，因此會透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貿易障礙給消除掉，正是內部化的例子。

四. 折衷理論 (Eclectic Theory)

Dunning (1981) 結合了產業組織組織、產品週期理論及內部化理論，提出了折衷理論。認為決定對外投資要素可分成三個部份：

(1) 所有權優勢 (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

此優勢就是產業組織的運用，當廠商對外投資時，廠商之所以能與被投資國的廠商競爭，是因為本身具有被投資國所缺之的特有優勢，如商譽、行銷、管理及技術等無形資產。

(2) 區位優勢 (location advantage)

此優勢是從產品週期理論發展出來的，廠商將產品不同階段的性質，選擇到適合的地方生產。廠商之所以選擇到國外直接投資，是因為地主國本身所具有的特有優勢，如資源稟賦、投資環境、運輸成本、政府政策及市場規模等優勢。

例如：Lin and Png (2003) 就利用台商赴大陸投資地區的資料，探討投資距離與投資型態之間的關係。

(3) 內部化優勢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

此優勢就如同內部化理論，廠商選擇對外投資是因為可以減少交易成本、降低道德危機、避免當地政府的干涉等，也就是將外交易的不利因素給消除掉。但前提是內部化所帶來的利益必須大於市場直接交易的便利性，如果中間財或生產要素市場效率高，則內部化並無必要。

五. 總體經濟分析理論 (Macroeconomic Approach)

Kojima (1973) 和 Ozawa (1979) 觀察日本在 1960~1970 年代的對外投資行為，認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理由並不是廠商本身具有特別優勢，而是總體經濟條件改變 (如：工資上漲、匯率升值及環保問題等)，使得廠商 (特別是勞力密集及低技術密集廠商) 在本國喪失競爭力，因此必須到更有利於廠商發展的環境，如到低工資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Yu (1990) 和 Jeon (1992) 也在實證的研究中，證實了工資上漲、匯率大幅升值等總體環境惡化，均是廠商採取對外投資的原因。

總體經濟分析理論與 Hymer 提出的產業組織理論，兩者差異非常大，主要是美國與日本廠商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不同。美國廠商是以擴大市場佔有率為主要目的，屬於擴張型對外投資 (expansionary FDI)；而日本廠商是為尋找較低的生產成本來維持產品競爭力，屬於防禦型對外投資 (defensive FDI)。Haymer 的理論是由廠商個體觀點來分析，而 Kojima 和 Ozawa 則是以總體面來討論。而 Chen (1992) 認為這兩種理論其實是一體兩面的，總體條件和廠商特有優勢應是彼此互補的。我們必須同時考慮到總體和個體因素，以及了解廠商對外投資的策略為何，這樣才能在對外直接投資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二節 對外投資對母國就業影響的實證文獻

國外文獻

過去國外探討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影響的文獻中，大部份認為廠商採取對外投資，會重新配置 (reallocation) 在國內的生產活動。例如：高所得地區的廠商，會利用與低所得地區的要素價格差異，將勞力密集活動配置在低所得地區，而資本或技術密集活動則留在國內發展，國內就業結構因而改變。但不同的對外投資策略，對國內就業的影響也就不一樣，因此造成各國實證結果的不一致。

Kravis and Lipsey (1988) 認為對外投資可從貿易的效果來影響國內就業，如替代國內出口，以及國外生產回銷至國內，均會造成國內就業減少。對外投資也會產生非貿易效果，如對外投資會替代或排擠國內的投資，造成國內就業的減少。即使對外投資對國內的生產沒有影響，國內就業結構也會因對外投資使國內的生產階段或過程重新配置而改變。例如，廠商將勞力密集或低技術密集生產過程移至國外，國內則發展技術密集的產業。國內低技術性人員的需求將會減少，而高技術人員的需求將會增加，總就業量的變動則會減少或不變。接著以美國 1982 年的廠商資料，分析對外投資對國內製造業及服務業，在就業及工資的影響。結果發現對外投資與國內就業為負向關係，尤其製造業比服務業更加明顯。而在工資方面，對外投資確實能提高國內工資。並作出以下結論：因為美國製造業廠商利用與國外要素價格的差異，將需要大量勞動的勞力密集生產過程移至國外，所以造成國內製造業的就業減少。而服務業的負向關係不明顯，是因為服務業不易將生產活動依要素價格的差異分開來經營。另外，對外投資使得國內少雇用低技術性勞工，多雇用高技術性勞工，因此是造成國內工資上升的原因。經由上面兩個結果，間接也證實了對外投資會減少國內的勞力密集度，以及提高國內的技術密集度。

Blomström, Fors and Lipsey (1997) 同時以美國和瑞典的資料，並將對外投資地區以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作區分，來探討對不同地區的投資對國內就業的關係。(1) 在美國方面，以 1989 年製造業廠商的資料，結果發現對外投資與國內就業為負相關，而且主要是來自於在開發中國家的投資。(2) 在瑞典方面，利用 1970、1974、1978、1986、1990、1994 年六個年代的廠商橫斷面資料，結果發現對外投資與國內就業為正相關，但相關程度逐年遞減，而正向效果主要來自在開發中國家的投資。如果將就業區分成白領和藍領，結果發現對外投資與藍領階級的就業為正相關，但與白領階級的就業只有在 1970 及 1974 年呈現正相關。而到已開發國家投資對藍領階級的就業為正相關，且非常顯著，但對白領階級就業則呈現負相關。至於到開發中國家投資對國內白領或藍領階級的就業都是正相關。

美國與瑞典的實證結果完全不同，作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兩國廠商對外投資的策略不同所造成。美國充分利用國外的要素價格差異，將勞力密集生產活動移至開發中國家，國內則發展技術密集活動，因此減少了國內的勞力密集度，國內就業因而減少。而瑞典廠商對外投資地區主要是在已開發國家，瑞典廠商將技術密集活動（如 R&D）移往美國及歐洲等已開發國家，國內則發展勞力密集活動，造成國內就業增加，且主要是來自於藍領階級。而且瑞典廠商在開發中國家的主要投資地區為拉丁美洲，是為了解決當地進口替代的政策，因此對國內就業量影響不大。

Lipse y, Ramstetter and Blomstrom (2000) 則以日本資料，並加以比較日本與美國，及瑞典之間對外投資策略的差異。利用日本 1986、1989 及 1992 年三年資料，其中在測討對外投資是否會使母公司雇用人數減少的部份，迴歸結果多數為不顯著，而在顯著的部份中多為正面的效果，認為是母公司管理方面的雇用人數增加的緣故。在負面效果則是集中在已開發國家的投資，但有隨著時轉變成正的效果的趨勢。接著作出下面結論：美國充分利用國際要素的差異，將勞力密集活動配置在開發中國家生產，所以對外投資造成國內就業減少；瑞典則主要利用先進國家的環境，在開發中國家大量投資技術密集的活動，勞力密集活動則留在國內並加以擴大，因此對外投資增加了國內的就業；雖然日本與瑞典結果相同，對外投資均使國內就業增加，但日本主要是為了支援國外子公司活動，國內大量增加管理及服務等人員所致。

另外，有些文獻則是利用超對數成本函數 (translog cost function)，來探討母公司與子公就業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同地區子公司就業的關係，例如：

Brainard and Riker (1997) 利用美國廠商 1983 到 1992 年之間的縱橫資料，以超對數成本函數得出要素需求方程式，從交叉彈性及要素需求彈性去探討到不同類型地區廠商對要素需求的關係。結果顯示美國母公司與國外子公司對勞工雇用替代性很小，而相同類型的國外子公司之間就業是替代的，不同類型的國外子公司之間就業則是互補的。

Braconier and Ekholm (2000) 利用瑞典 1970、1974、1978、1986、1990、1994 年的製造業廠商資料，利用超對數成本函數得出交叉工資彈性去比較到高所得和低所得地區投資的子公司就業與國內母公司就業的關係，並探討兩地子公司就業的關係。結果發現如果在高所得地區投資，則子公司就業與母公司就業呈現替代關係；而在低所得地區投資，則沒有顯著效果。至於不同所得水準投資地區的子公司就業，彼此是互補的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有相當多的文獻利用超對數成本函數推導出工資份額函數，並以非生產性員工的工資份額當作是技術升級 (skill upgrading) 的指標，探討對外投資是否是造成國內技術升級的因素。理論上廠商依比較利益而進行對外投資，國內就業結構會因此而改變。但是在實證上，並沒有一致的結果，相關的探討文獻如下：

Berman, Bound and Griliches (1994) 觀察美國製造業在 1980 年代，非生產性員工的比例的增加為一長期的趨勢。首先將製造業就業結構拆解成產業間的變動和產業內的變動，結果發現就業結構的變動主要來自產業內的變動。而一般認為貿易會造成產業間變動，而技術進步則是造成產業內變動的主因，因此作者基

於貿易並非造成就業結構變動的主因，於是也排除了海外代工為影響就業結構變動的因素。接者以超對數成本函數推導出非生產性員工的工資份額函數，並加入電腦設備投資和 R&D 投入當作技術的變數，來進行迴歸分析，結果發現電腦設備投資和 R&D 投入均會使非生產性員工的工資份額增加。

作者最後得出三點結論：(1) 美國製造業就業結構的變動主要是來自於產業內的變動，而不是產業間的變動；(2) 貿易和國防工業支出只會小部份影響就業結構的變動；(3) 非生產性員工需求的增加主要來自於電腦設備投資和 R&D 支出。

Feenstra and Hanson (1996) 主要探討海外代工對國內非生產性員工的影響，利用 Berman et al. (1994) 迴歸模型，加入了海外代工變數，定義海外代工為進口非能源性材料中，中間財所佔的比例。結果發現海外代工與美國製造業在 1979 到 1990 年之間產業內勞動需求偏往非生產性員工，有非常大的關係。

Slaughter (2000) 探討美國製造業發生產業內就業需求朝向技術性員工，是否與多國籍企業選擇海外生產有關。使用美國 1977 到 1994 年之間的製造業資料，並修改 Berman et al. (1994) 迴歸模型，加入海外生產的變數當作迴歸模型。但實證結果並不支持海外生產會造成美國技術升級的假設，因此亦無法證實海外子公司的活動會代替母公司非技術性勞力密集的活動。

Head and Ries (2002) 首先將對外投資分成水平投資和垂直投資兩大類。並認為有三種情況：(1) 把所有生產方式均複製到國外子公司的水平投資方式，將透過母公司規模縮小而提高母公司技術密集度，但經控制廠商規模之後，對外投資將不影響母公司技術密集度。(2) 如果是國內外均生產最終財，但技術密集活動留在國內的水平投資方式，將使母公司技術密集度增加。(3) 廠商如以垂直投資方式，預期到低所得國家投資將可提高母公司密集度，但到高所得國家將降低母公司密集度。接著修改 Berman et al. (1994) 迴歸模型，將非生產性員工的工資份額和廠商平均工資當作是技術密集度的替代變數，利用日本 1965 到 1990 年之間的多國籍企業的資料來作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廠商到低所得國家投資對於母公司技術升級有正面影響，而到高所得國家投資則對母公司技術升級有負面影響。⁵

⁵Lipsey (2002) 認為選擇對外投資的廠商，國內母公司會朝向更技術密集的活動發展，但是沒有選擇對外投資的廠商，技術密集度的改變較小，因此對外投資對整體產業技術升級的效果並不明顯。因此，從 Slaughter (2000) 以產業資料作分析所得出的結果並不顯著，以及 Head and Ries (2002) 以廠商資料作分析所得出的結果卻有顯著的效果，更可看出有對外投資與沒有對外投資廠商之間的差異。

國內文獻

有關國內探討對外投資對就業影響的實證文獻中，大多利用產業關聯表及次級資料來分析，去推估國內就業的影響。在就業的觀察也都集中在總就業上，對於不同類型的勞工（如高技術與低技術人員）的影響，國內相關文獻著墨不多。相關文獻如下：

陳添枝等（1987）利用 1981 年勞動、資本、產出及產業關聯表等資料，以及投審會過去統計我國製造業對外投資金額，推估對外投資對國內的就業影響。估計 1987 到 1996 年之間的就業損失約為 15 萬到 18 萬人，此損失並不大，應該可以被新投資所創造的就業所補足。

嚴大宗與李惠琴（1990）利用 1987 到 1989 年之間台灣輸往大陸之貿易資料及產出勞動比例，以及 1986 年之產業關聯表，推估 1988 年及 1989 年之間赴大陸投資的出口效果和資本取代效果的就業影響。結果發現赴大陸投資對國內就業，除鋼鐵業外，在大多數產業是不利的，其中又以紡織、塑化和機械影響最大。

洪麗春（1991）觀察 1981 至 1986 以及 1987 至 1990 年，利用失業率、就業和失業人數來探討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影響。其認為 1987 年以後的對外投資對製造業的就業有不利的影響，但在服務業的成長，使得服務業就業人數成長能夠彌補製造業損失的就業機會，總就業人數能夠持續成長。因此在 1990 年為止，對外投資未對國內就業有很大影響，反而對基層勞工短缺問題有所幫助。

李玉春（1993）以 1991 年當地核准投資金額和 1989 年產業關聯表等資料，推估在東南亞四國及大陸投資將使國內產出減少，進一步使國內的就業減少。認為 1991 年在東南亞四國和大陸投資金額為 831 億元，衍生使國內產出減少 1000 億元，進而製造業的勞動需求減少 5 萬人。另外再以 1982 至 1992 年之間國內受雇員工之職工比例等資料，觀察國內就業結構的改變。認為對外投資使國內職員比例增加，而工人比例減少，表示國內生產部門正逐漸縮小而管銷部門正在擴大中。在 1994 年作者進一步分析，估計在泰、馬、印、菲、越和大陸地區投資，將使國內產出減少，估計在 1986 至 1993 年之間製造業就業損失約 22 萬人。

陳添枝與陳一萍（1993）認為「防禦型」的對外投資將使國內相同產業的產出減少，而「擴張型」的對外投資則使國內相同產業的產出增加或不變。並假設在低工資國家的投資以防禦性為主，在高工資國家的投資以擴張性為主，結果發現當防禦性投資大於擴張性投資時，國內該產業之生產將因此而減少。接著估計出各產業因防禦性對外投資而造成的產出變動量，且利用各產業勞動與產出之比例關係，推算出 1986 至 1991 年之間各產業勞動的影響。結果發現防禦性對外投

資，對職員或工人人數方面的影響，均是減少。

顧瑩華（2002）利用 1993 年和 1999 年經濟部統計處的《工廠校正資料》，分析有無對外投資廠商在雇用行為之間的差異。結果發現對外投資廠商並沒有減少國內的雇用，反而增加國內的雇用，且比未對外投資的廠商更傾向多雇用職員。但只在大陸地區投資的廠商就業成長只有 1.7%，且工員減少 10%，職員增加 1.2%；在大陸地區以外投資，就業成長為 27.3%，且工員增加 7.7%，職員增加 32.5%；在包括大陸地區及其他地區投資的廠商，就業成長為 21.2%，且工員減少 7%，職員增加 10%。因此作者認為投資大陸地區並沒有造成國內失業，但對國內就業的提升沒有太大幫助。

國內文獻除了利用產業關聯表及次級資料來分析外，另外，還有利用計量模型來分析對外投資與國內就業的關係，但數量並不多。相關文獻如下：

吳惠林與辛炳隆（1995）認為「防禦型」對外投資會造成產業外移，因而使國內就業減少。以「對外投資金額佔國內外投資總額之比例」來當作防禦型對外投資的替代變數，且利用勞動需求函數、勞動供給函數和對外投資決定函數，聯立三條方程式，並以三階段最小平方法（3SLS）為估計方法，探討 1985 至 1993 年之間，防禦型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影響。結果發現防禦型對外投資對國內的勞動雇用有不利的影響。進一步探討發現對外投資與受雇職工比例之間並無顯著關係，並沒辦法證實對外投資會使國內職員對工人的比例上升。

李俊屏（1997）以 1985 至 1993 年之間的製造業資料，利用利潤函數所求的勞動需求函數，整理成相對就業需求函數，來探討對外投資對不同員工比例的影響。結果發現對外投資占國內外投資比例，對國內職工比例有正面的影響。進一步將勞工分類，發現對外投資在國內管理人員的需求是有利的，而技術工的需求是不利的。

周尚民（1998）以 1981、1986 和 1991 年製造業資料，利用超對數成本函數推求各類員工的工資份額函數，以 SUR 估計方法來探討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的影響。結果發現對外投資比例對管理人員的雇用是有利的，而對技術工的雇用是不利的。認為對外投資提高了管理人員的重要性，而國內的技術工則被國外的技術工所取代。

在國外的文獻中，大多以美國、日本或瑞典等先進國家為分析對象，然而，台灣屬於新興工業國家，加上國內以中小企業為主，而且在技術、品牌和行銷上的優勢並不明顯，對外投資地區又集中在大陸地區，更是不同於先進國家進行對外投資的情況，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台灣廠商進行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及產業

發展的影響。另外，國內文獻則大多利用產業關聯表及次級資料來分析，且只考慮到對外投資替代國內就業的部分，卻忽略對外投資所創造出來的就業及產業升級的效果。且利用計量模型來探討的文獻並不多，也有不足的地方，如吳惠林與辛炳隆（1995）則主要探討防禦型對外投資，也忽略到對外投資對就業結構的影響；周尚民（1998）的實證資料僅是以橫斷面資料作分析，並未考慮到時間因素；李俊屏（1997）則只是探討對外投資對各類員工相對就業比例的影響，但也無法直接得知對外投資是否能增加高技術密集的活動，因為高技術員工比例的增加也有可能只來自於低技術員工的減少。鑑於以上理由，為了更詳細探討對外投資對國內就業及產業的影響，本文專注於產業內就業結構的變化與造成因素，將勞動受雇人數拆解為產業間結構結整的變動與產業內生產型態的變動，⁶ 並且同時探討對外投資對不同技術層次員工的受雇人數、所佔比例、以及工資份額的影響。

另外，必須提到的是，當廠商利用對外投資，來重新配置國內的生產型態時，本身可以享有技術升級的好處。而未採取對外投資的廠商，勢必也會將國內的生產結構作個改變，以便能夠與其競爭。加上技術外溢的結果，雖然對外投資可能只是個別廠商的行為，但是相關廠商都能受惠，達到產業垂直升級的效果。因此，在後面實證分析中，資料選擇以產業資料來用，一方面是廠商資料不易取得的原因外，另一方面，在假設廠商的對外投資行為可以影響到所屬產業的前題下，因此選擇產業資料來使用。

⁶ Berman et al.（1994）和周尚民（1998）則是對勞動受雇比例作解析。